



从石头滩会战 到大包干， 农场迎来全盛期

尹锡华

学大寨

1974年兵团撤销后，加奴农场重归农垦建制，赵连禧出任农场党委书记，从长征农场调来张少明任场长。当时，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在高潮中。上级盲目下达命令，要求各农场在若干年内达到粮油半自给甚至全部自给，不管有无条件都要开水田旱田种粮食。根据自然条件，五队集中力量开垦了几亩水田，但这远远不够，于是开始大量造旱田，动员大家发扬大寨人三战狼窝掌、万里千担一亩田的精神，先开垦六十五亩山顶荒地，又开垦了坡田20多亩旱田，以及12号、18号林段和驻地周围的小块地，合共一百亩左右，但是收益却很少。

石头滩会战

为了造更大声势，农场又集中力量开展石头滩大会战，学大寨人炸石头造田。当时的做法是造大梯田，在山坡上用石块砌成1米多高的田埂，将土壤围住。这样的工程相当耗费人力物力，所以每个连队都派出很多人参加，中小学生也要经常参加劳动，路远的连队职工就近集中住宿在农垦营根机械厂临时搭建的棚屋里。当时已是冬天，大家经常是顶着寒风细雨工作，日夜奋战了三个多月，一直干到春节前一天才撤回家过年。春节前几天，寒潮来袭，多个连队出现霜冻，因大部分人力都参加大会战了，没有做好防寒工作，造成大量小橡胶苗和牲畜冻死，开割的橡胶树大面积冻伤。

后来农场又组织人力物力，加派了几台推土机，在17队附近开水田旱田。做法是改河道，筑鱼塘，建小水电站。我带了几十个人参加会战，住在那里干了两个多月。工程设计的都是大梯田，工程量也十分浩大，花了几万个劳动日才造出一百多亩梯田。那两年全场造田数千亩，造出来的大梯田看似壮观，其实表土被破坏，农作物产量很低，排水设施建得不合理，几次山洪暴发，就冲毁不少。有很多地段场社界线不清，有争议的地方也造了田，造成农场与农村关系紧张，后来有些田还被农民夺了回去。总之，花了大量人力、物力，收获并不多。

石头滩会战时，有一天赵书记在公路旁等车回场部。他见到我，把我拉到一边说：你一贯讲究实干的，说说你对这次会战的真实想法。我说我确实想不通，为什么之前已有多次惨痛教训，今天还要组织这样的蛮干。特别是石头滩这块地，这么多石头，开出来能种东西吗？赵书记说：“有人还说这块地比大寨的狼窝掌条件要好多少倍呢。我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不敢言。当前的形势逼人，上级命令不能违抗，有意见只能保留，行动上还得积极干。我们组织这样干，上级还批评声势不够大呢。以后你要注意，开会发言时不能再说这些话啊。”

改革与大包干

1978年冬至1979年春，农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农场要改革，进行大包干，各级要自负盈亏。采取的经营措施基本是1965年的翻版，只是各项作业投工、投资和超产奖励多些。当时超产分成是场占30%，生产队留20%，50%做奖金分配到个人，留队部分做生活福利用。各项指标下达到队，以队为单位组织实施。队制定措施，把任务分配到班组。因为过去多次反复无常，群众怕领导说话不算数，说“我们上了太多的当，怕了”。后来各级党组织层层发动，反复宣传三中全会精神，特别强调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家都看出是符合国家和老百姓利益的。这样我们新的大包干方案才贯彻下去，还发动大家在完成分配任务的基础上大搞种养业，准许职工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自由安排工作时间，这样工人的积极性又起来了。开始时有些领导怕职工不自觉，变成自由散漫，不好管。实际上很多工人没听到出工的钟声就出工了，有些男职工天一亮就出门干活，留女的在家煮好饭送上山吃，天气好的时候抓住时机拼命干，工效、质量比原来大大提高。工人越干越有劲，后来队里的出工钟都不用敲了。

庆丰收

生产管理自主权下放给连队和职工，这是过去二十几年想都不敢想的事。为此，我带好连队班子，科学安排生产任务和计划、用工，物资发放做到精打细算，还经常深入工地检查指导，有时候还同工人一起干活，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到1980年年终结算，五队完成任务最好，经济效益居全场之首，超产盈利5万多元，除场队留成外，还有2万多元作奖金分配。这是我们在农场工作几十年第一次得到这么多的奖金，是大家共同努力得来的。经过讨论，支部做决定，奖金大致平均分，每人得了190多元，队里主管领导只是多领30元，其他队干部多领20元。那一年春节前夕，奖金发到职工手里，大家十分高兴。那时家家户户种有花生，养有猪和鸡鸭，农场养猪场还分来些猪肉，队里又放鱼塘捉鱼。过年时每家家都放了几十元钱的烟花炮竹，家家户户贴上了对联，放假十天大庆丰收。那几年，五队年年都是先进单位，我作为支部书记，也先后被评为加奴农场和通什农垦局、广东省农垦总局的劳动模范，获得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奖状。

1985年，农场提倡干部年轻化，我积极响应号召，提前办了退休手续。回忆在海南农垦二十八年走过的路，可谓在荆棘中杀出一条血路，十分坎坷艰难，但也算苦尽甘来。加奴农场虽然经过几次大运动、大起大落，浪费了许多汗水，但成绩也巨大的。建场20多年，加奴农场在一片大荒山里开垦出2万多亩的橡胶园，成为拥有2000多职工的大企业，这是两代农垦人用心血打造的。

（全文完）（文稿整理：一平）

友谊大桥的故事

文/吴捷 吴瑞炎 图/吴瑞炎



春日，高州鉴江水面波光粼粼，银灰色的友谊大桥横跨在南塘镇彭村与曹江镇珊瑚村之间的鉴江河上，将鉴江印象东线与西线紧密相连，犹如一条巨龙静卧江面。大桥桥头的功德碑上，镌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捐款数额大至26万元少至50元不等，每一道刻痕，都承载着两岸三四万村民的心血与汗水。吴大伯手扶桥栏，缓缓说道：“通车那天，桥尾挂着一副红布对联，横批是‘友谊大桥’，上联‘万民感恩’，下联‘高歌颂国杨’。”他的手指轻轻抚过桥栏，仿佛在触摸那段难忘的岁月，“后来，该对联被彭村村委会书记吴国杨要求拆下，但那十个字，早就铭刻在两岸村民的心里。”

童年渡口：江水中的誓言

1973年的一天，11岁的吴国杨与小伙伴早早扛着两根单竹，挤上了渡船。细雨绵绵，竹杆上的水滴不断落下，和他额头的汗珠一起，在船板上溅起细碎的声响。吴国杨和小伙伴带着这两根单竹到曹江圩销售，得款五角二分钱。他们买了粉皮当作午饭，又买了一条擦汗带以及几个橄榄后，身上仅剩三分钱。而当时，坐轮渡一个来回需要5分钱船费，去时不收费，回时一起收费。“文富仔，没钱就滚下去！”渡船工先后两次把小国杨和小伙伴掀下船，还厉声呵斥，那呵斥声如同一把利刃，直直刺进小国杨的心里。

当天上午，鉴江中上游突降暴雨，中午时分，江水迅猛上涨，浪涛拍打着渡口。吴国杨和同伴被赶下船，两个瘦小的身影站在跳板上，衣裤早已被雨水浸透。无奈之下，他们只能赤身走到距离渡口约一公里的上游。吴国杨和小伙伴脱光衣服，将其裹成包袱顶在头上，再用捡来的麻条紧紧绑住，防止衣服被江水冲走。吴国杨在江边长大，熟悉水性、擅长游泳，他借着水势，朝着彭村的方向奋力游去。冰冷的江水一次次漫过胸口，甚至头顶，吴国杨手中紧紧攥着剩下的三分钱。浪头打来，他被呛得咳嗽不止，脚底和身躯也多次被江中的杂物划破，可他始终死死盯着彭村的方向。当小国杨拼尽全力好不容易游到岸边，抓着长在岸边的竹枝爬上岸时，手中的三分钱仍带着他的体温。“等我以后有出息了，一定要建一座桥，让村里人再也不用受过江的苦！”在吴国杨幼小的心灵里，这个誓言伴随着江水的轰鸣，深深扎根。

2008年，已当选彭村村委会主任，后又兼任彭村党支部书记的吴国杨，在一次党员大会上，立下“贪一罚万”的誓言。台下的老党员们并不知道，这个誓言的种子，早在35年前的江水中就已悄然种下。而村民们更想不到，当年那个在江水中拼命挣扎

的少年，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这个誓言，让通车当天的红布对联，成为两岸人民心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建桥攻坚：两岸村民众志成城

2013年，鉴江彭村鸡朗渡口，依旧是两岸四五万村民的“心头大患”。洪水季节，渡船停摆，农作物只能烂在地里，孩子们被迫停课，老人们也常常整夜难以入眠。吴国杨揣着一本磨破的笔记本，沿着江岸徒步勘测，不知磨穿了多少双鞋底，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两岸村民因过渡难而遭受的种种“江害”。当他向当地政府立下“发动村民自筹200万”建桥的军令状，并得到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时，所有人都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毕竟，当时彭村集体账户里仅有1800元。有人甚至冷嘲热讽，说吴国杨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自不量力。

然而，奇迹往往源于民心。吴国杨和他的兄弟四人共捐款12万元，这一举动如同星星之火，瞬间点燃了两岸村民的热情。彭村的广播里，传出他略带沙哑却坚定有力的声音：“10元不嫌少，100元不算多，这桥是咱们自己要走的路，自己要过的桥！”五保老人吴大爷拄着拐杖赶来，把自己攒了十年的300元塞进捐款箱，里面还夹着一张字条：“党恩记心头，国杨是带头人”；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连夜转账，附言写着“给家乡的桥添块砖”；就连邻村的老人也赶来捐款，笑称“沾沾彭村的福气”。短短一周时间，就筹集到130万元善款，每一张纸币都带着乡亲们的体温，每一笔捐款都饱含着大家的信任。

尽管彭村村民筹集的130万元，加上对岸曹江镇珊瑚村民筹集到的70万元，总共200万元，与建设友谊大桥所需的近千万资金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这已极大地减轻了政府

的负担。

通车时刻：红布对联书写民心

2016年6月23日，鉴江两岸彩旗飘扬。曹江镇珊瑚村的罗先生突然带着十几个村民，在桥头用单竹搭建临时竹排门楼，挂上对联：“吴书记，这是我们连夜赶制的！”红布展开的那一刻，阳光穿透云层，“万民感恩，高歌颂国杨”十个金字在江面上熠熠生辉，横批“友谊大桥”。这是两岸人民对吴国杨最真挚的赞赏，如同一片赤诚丹心。

村民罗先生抚摸“国杨”二字，老泪纵横：“孩子们说，这是‘国家的杨树’，扎根泥土，挺直腰杆。你看，江边的杨柳树，夏天遮阳，冬天挡风，不就像吴书记吗？”话音刚落，桥上响起激昂的合唱，两村村民手挽手，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伴随着江风，飘向远方的青山。吴国杨凝视着对联，突然想起2008年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他在村委会立下“给一做二”的承诺。如今，村民们用最质朴的方式，把党的恩情与他的名字编织成歌，这比任何荣誉都更为珍贵。

那副对联在桥头挂了一段时间后，被细心的村民收了起来。有人用手机拍下照片，存在相册里反复翻看；有人把对联内容记在烟盒上，逢人便讲；更多的人则将它铭记在记忆深处——因为对联上的每一笔，都书写着他们亲身经历的感动：是五保户捐出养老钱时微微颤抖的双手，是吴国杨为建桥不惜抵押自家城里房屋贷款的决心，是万人空巷期盼友谊大桥建成的热切渴望。

时代回响：桥上车轮碾过的传承

如今的友谊大桥，日均通行车次1000多，淮山、荔枝等农产品顺着桥

面运往城市，游客也顺着桥面走进彭村的荷花池。友谊大桥桥头的功德碑旁，虽已不见红布对联的踪迹，但每当暮色降临，村中老人总爱坐在桥边，向晚辈讲述当年的故事：“吴书记站在对联底下，背影像桥柱一样挺拔。”村中老人总是爱指着功德碑上自己的名字说：“不是因为有钱，而是因为信得过吴书记。你看这桥，不就是‘万民感恩’最好的见证吗？党恩不在天上，就在吴书记发动村民捐款建桥的日子里。”

退休后的吴国杨仍坚持每天巡村，路过桥头时总会驻足停留。有人问起那副对联，他微笑着说：“布会腐烂，字会褪色，但人的志向长存。”他望着桥下潺潺的流水，想起通车当天村民挂对联的场景——红布在江风中猎猎翻飞，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照亮着两岸人的笑脸。如今，那团火住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化作村口公平买卖的“良心秤”，化作代代相传的义工精神，化作孩子们写在作文里的“吴爷爷的桥”。

暮色中的鉴江泛起层层细碎的金光，桥头的石刻在路灯下愈发清晰。吴国杨的身影被拉长，与桥栏上的名字融为一体。吴国杨说：“桥是有形的，民心是无形的。”而村民们知道，那个通车日的红布对联，早已化作鉴江的涛声——它是少年在江水中许下的誓言，是千万人肩头的希望星光，更是党心与民心相印的不朽赞歌，在岁月的长河里永远回荡。党和政府，我们衷心拥护；国杨书记，我们由衷钦佩。在吴国杨书记的带领下，如今的彭村已成为全国文明村，荣获10个国家部级荣誉奖项，以及多个省、地市级荣誉。吴国杨个人也多次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等荣誉，还当选感动茂名的十大人物，堪称人民楷模。

工时每人除工分外，还分到一碗米饭和半截煎熟的咸鱼。这在当时，算是一个丰厚的犒劳了，参加车水的社员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家捧到饭，便急不可耐地吃起来。可母亲捧到饭后，却舍不得吃，她想起了家中的我们，慌称不饿，捧起这碗饭急急赶回家，唤醒熟睡中的我们。母亲把饭均成三小碗，把半截咸鱼也分成三份，分给我们兄弟三人。

我们太不懂事了！看着眼前的米饭和香喷喷的咸鱼，眼睛发亮，口水直流，捧起来就吃，狼吞虎咽！哇，实在太香了，不，实在太饿了！那模样，吃起来简直是风卷残云。坐在一旁的母亲看了，时不时轻声细语地说，慢点，慢点，别噎着了。

吃完了，还用舌头舔舔碗边，母亲看着我们这个馋相，忍不住笑了。我们吃完了，母亲才默默走到灶台的铝锅前舀起当晚剩下的米汤，“咕噜咕噜”连喝了好几碗，可见母亲又饥又渴到了极点。

这一幕，至今还深深烙在我的脑海。母亲的一生，为了儿女、为了这个家、为了生产队，付出的实在太多了！母亲这一辈子，实在太辛苦了！

值得欣慰的是，母亲以她顽强的生命力，乐观向上的精神，还用她的善心好心，默默为他人做了不少好事善事，深得众人的敬重和爱戴！她活到93岁，享受了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也是村中最年长的寿星。

母亲琐忆

陈冲

母亲离我们而去已经两年多了，但她生前的点点滴滴，还时不时涌于心头，浮于眼前，仍像当年那样慈爱、温暖。

01

我兄弟姊妹6人，我为长兄，兄弟仁为哥，余三人姐妹。

母亲刚生下三弟时，不能干重活。重活本是大人干，但父亲远在30里外的县城工作，身为长兄的我，便顺理成章成了家中的“大人”了。

那天早上，母亲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帝福（我的乳名），你到井里挑几桶水回来救急吧，水缸里连磨墨的水都没了，缸底可以晒谷了。

我见母亲这等模样，鼻子酸酸的。我刚够得上一担桶高，听了母亲的吩咐，二话没说，挑起两只桶晃晃悠悠的到了井台。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先用竹竿放下一只桶，然后用竹竿尽处的横杠套住桶梁。但无论如何摆弄，就是套不住，急得我满头大汗，不知所措。请人帮忙吧，可井台除我之外，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万般无奈，只好垂头丧气回家了。“救兵”，“救兵”自然是母亲了。母亲听了，没有说话，无奈地站起来，拖着虚弱疲软的身子，蹒跚着往井台走。

我跟在母亲身后，惴惴不安，生怕母亲的责骂。到了井台，以为母亲会教我如何套住桶梁，如何把桶提

上，然后由我挑回家。但母亲不这样，提起水后，强打精神，她自己挑回去了。我跟在后面，更是不安和内疚。回到家，我像犯了大错，低着头站在母亲的面前，准备接受她的责骂。但母亲没有骂我半句，反倒使我更惭愧，乃至几十年后，每每想起，还觉得难过、内疚，觉得那是对母亲一个莫大的亏欠！

02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家乡还没有电力机械加工粮食，平日吃的米粮，得靠人工磨谷、舂米。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在乡下生活，其时三个妹妹尚未出生。母亲身单力薄，一个人又磨谷又舂米，太辛苦了，便动员我帮忙，许诺：帮她磨完谷舂完米，她负责筛米，我打一升米“煲宵夜”。我高兴地答应了。母亲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这磨谷、舂米的私活，自然是在晚上了。

母亲和我在队屋里磨谷、舂米，两个弟弟在旁边玩耍。到了舂米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那时天热，两个弟弟倒在碓坎（臼）前的灰沙地板上睡着了。

舂好米后，母亲挑上米，我叫醒两个弟弟跟在母亲身后，屁颠屁颠地小跑。回到家里，母亲筛米（把米与糠分开），我“煲宵夜”。没有菜，就在煲熟的饭上洒点油和盐，俗称“油盐饭”。母亲筛完米，我的饭也煲熟了，

重又唤醒两个弟弟一起“吃宵夜”。

睡眼惺忪的俩弟弟，听说“吃宵夜”，又是“油盐饭”，马上来了精神，眉开眼笑，急急拿碗装饭。母亲叮嘱，每人只有一碗饭。谁料我们“小鬼大”，都把饭装得满满的。那时生活困难，平日是白盐稀粥，今夜好不容易吃上一碗“油盐饭”，自然装得满满实实。可怜母亲，最后装饭时连半碗都没有了，然而母亲没有责怪我们，只是和蔼地看着我们笑。

这一幕，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写下，我仍忍不住掉泪！

03

上个世纪60年代，农村还是集体所有制，生产队是最基层单位。社员出勤记工分，队里收获的粮食分配，凭工分和人口相结合。工分多者，除去抵消分配的粮食外，余下的工分便折成人民币分到户，名曰“盈余户”。反之，工分抵消所分粮食不足部分，也折成人民币落到户，名曰“超支户”。我家是队里出名的“超支户”，超支最多。一年两造，每造要交超支款在150元左右。这在那时，可是个大数目了。母亲为减少这超支款，在生产队里专挑工分多的苦活累活干，此外，家里还养了一头母猪，靠母猪下仔养大出售交超支款。

其时抗旱，使用的是人力水车。印象最深的是，有次夜里突击车水抗旱，从晚上8点直干到凌晨12点。收